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BEIJING SHIFAN DAXUE SHIXUE WENKU

唐史识见录

宁欣著



商務印書館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唐史识见录

宁欣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识见录/宁欣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5793-6

I. 唐…II. 宁…III. 中国—古代史—唐代—文集
IV. K24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79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TANGSHISHIJIANLU

唐史识见录

宁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793-6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26.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问：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主任：郑师渠 晁福林

副主任：杨共乐 李 帆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东平 宁 欣 汝企和

李梅田 张 皓 张建华 侯树栋 耿向东

郭家宏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又有一批崭露头角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大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

2 唐史识见录

史学的压轴之作”。其他教师的学术论著也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类学术奖项,得到学界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铸就自己的辉煌,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社会政通人和,学术研究也日新月异,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本系决定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系学者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整体学术水准。同时,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也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序

何兹全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唐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城市经济的复兴；
- 二、劳动人民身份走解放；
- 三、走出宗教神权的分配，回到人间。

战国秦汉时期，城市经济发达，全国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and 城郊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衰落，很多秦汉时期繁荣兴盛的城市变成空无人居。有一时期，北方有些地区，钱币已不通行，以布帛为币。出门在外，要带着布匹做旅费。隋唐时，城市和城市经济，又得到恢复。人口慢慢向城市转移，城市经济又发展起来。

两汉时代，郡县管领下的五千万左右的人民，都是自由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佃耕农民，也是自由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客，都是“身系于主”的半自由人。隋唐时期，“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租佃关系又复出现。租佃关系是经济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人身依附关系、隶属关系的解放。

南北朝时期是宗教（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时期，国家户口只有一二千万的时候，佛家的僧尼却有一二百万，几乎到十分之

2 唐史识见录

一的比例。在街上的行人中,十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个是和尚、尼姑。隋唐时代,佛教还是比较盛的,但比起南北朝来,它是逐渐走出宗教的时代。从佛寺走向人间。人文时代代替了宗教时代。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它承前启后,是中国历史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时代,尽管中国的近代却迟迟就是不来。

宁欣教授完成大作《唐史识见录》征序于我。谨以素来积存于胸中的一个问题——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加以应征。是为序。

2008年2月15日

目 录

上编 选举与政治社会

中国古代选举的制度演变与观念更新·····	3
唐科举制研究百年考量·····	11
唐代官吏管理体制述略·····	36
唐代举士与选官的分合·····	40
唐代的选人与官阙·····	53
唐代门荫制与选官·····	66
唐朝铨选制的完善及流弊·····	81
唐代的荐举·····	96
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	112
考试舞弊所折射的社会变化——以唐宋时代为中心·····	127
“官民交接之枢纽”——以更为中心的考察·····	138
贡选的历史演变及在唐五代时期的发展·····	150
东亚世界与隋唐科举制度的文化考察·····	181

下编 经济视野下的城乡社会

唐后期经济监察职能的强化——以巡院为中心·····	189
---------------------------	-----

ii 目 录

唐朝的“江贼”与“江路”	200
唐代流动人口探析(一)——以长安举选人为中心	211
唐代流动人口探析(二)——以幽州地区为中心	229
唐代朝贡使析论	246
隋唐五代的城市与交通	256
城市与城墙	337
唐代农田水利法规与实践——以敦煌地区《灌溉用水章程》 为个案	343
主要参考文献	400
后记	406

上编 选举与政治社会

中国古代选举的制度演变与观念更新

中国严格意义上的选举行为,可追溯到上古时代,与绵延数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同历盛衰荣辱。岁月流逝,世事沧桑,但古代中国浩瀚典籍中所蕴藏着的制度文化内涵,钩沉探微、披沙拣金,仍渊源有自,流变清晰。数千年历史文明造就的健全、完善、严密的选举体制以及相关的制度、措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有的学者把文化析分为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两个系列(或两个层面),选举从制度文化的角度看,它的主流无疑是精英人物构筑的精英文化,但其非主流及潜流则属非精英文化或平民文化。由于两种文化的载体在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变动中的交流与转换,选举制度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就带有双重性的特点,这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事实。

文化就其发生发展而言,是以经济基础为依托的,文化载体就其社会属性而言,是经济关系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不同阶级、阶层在选举体制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都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其一,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是外部经济关系变化的反映,每一时期主导选官形式的确立,正是由这种内外变化所决定的。其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不同阶级的转换和同一阶级内

部的升降,促成了财富与权力地位之间的交易。在更新选举观念、修订选举标准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在探究封建社会选举制度的发展趋势时,抓住地主阶级本身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变化这两个关键点,也就把握住了其基本脉络。

政治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的政治从选官角度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贵族政治阶段。这一阶段以春秋时代为下限,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在诸侯分据的权力格局中形成的贵族政治。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形式是世卿世禄制,即世袭制。

二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过渡阶段。战国时代,这一转变业已开始。秦汉统一帝国,管理系统与贵族系统逐渐分离,政治体制已经向官僚体制转轨,但仍带有较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反映在选举制上,以举荐为中心环节的察举制居于主导地位,举荐制度虽然较为严格和具体,但标准却较为抽象。与察举并行的其他选官形式,如任子、郎官等,属于世袭制在新体制下的演化,并且尚不规范。从宗法制度中转变过来的地主阶级,还带有相当程度的宗法特点。表现在官制系统上即所谓的家国体制的混合,尤其是中央官制更为明显,从称呼到职能都未从家臣体系中完全脱胎出来。纯粹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应该说是在隋唐时期才得以确立。

三是官僚政治形成阶段。魏晋时期,在门阀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九品中正制居于选官的主导地位,制约着其他选官形式。九品中正制的制度化色彩无疑大为加强,但仍属贵族政治的范畴。然而,贵族本身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门阀世族基本应属于地缘意

义上的贵族,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宗法贵族相比,他们不是以与皇族的远近亲疏定尊卑,而是以某一地域为基点,以经济势力为基础,以家族为纽带,与官僚政治结合后才得以形成,又反过来限制了官僚政治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门阀士族是官僚政治的产物,而非血缘(贵族)政治的产物。科举制的萌芽出现在这个时期,并非偶然。

四是官僚政治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隋唐时期,地主的贵族化与贵族化的地主同步衰落,以三省六部制的确立为标志,官僚体制正式与贵族政治脱离。统治基础从根本上的变化,使得选官制度也发生了从量变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科举制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中确立和发展的。科举制不仅带动了选举方式的更新和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带动了选举观念的更新和选举标准的制度化。当然,这一更新进程的完成还有待时日;二为宋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宗法色彩大为加强,但已和政治脱离关系,与日益严密的官僚体系分道扬镳,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士绅集团。“取士不论家世”,表明了地主阶级在完成身份制向非身份制转化的过程后,在选举观念上的彻底更新。在选举标准上,抽象的“德”(并且往往与身份、地位、家世联系在一起)已让位给具体的“才”、“能”,科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主导形式,考试成为各个层次选拔人才的普遍原则,选举步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社会经济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商品,商品经济的活跃,可促成社会的两个变化:一是阶级和阶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阶级队伍的重新组合与社会阶层的升降转换;二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财富的积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社会及政治的巨大作用,财富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财富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

在经营交易中形成的公平竞争意识,间接影响并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公平竞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必然带来选举观念的彻底更新。科举制的确立以及考试原则的普遍实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屡有起伏,战国西汉时期较为活跃,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一度中衰,唐中叶到两宋时期,再次出现高峰。商品经济的活跃,对自然经济形成极大的冲击,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财富的积累冲破了社会身份的藩篱,“富”在与“贵”的角逐中,逐渐在政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社会造成长远与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具体到选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来。

观念的更新。中国自商鞅变法实行抑商政策,靠经营工商业致富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就跌落为“不得预士伍”,剥夺了工商业者在政治上进身的资格。社会舆论也无不轻商、贱商、鄙商,商业被视为“末业”。隋唐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第二个高峰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商人的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西京纪》、《独异志》中记载了两个事例:其一,唐高宗时西京(长安)有富商名邹凤炽,家产巨富,金宝不可胜计,邸店园宅遍布海内,四方物产为其所收。因女儿出嫁,邀请朝中士人赴礼席,宾客数千。邹凤炽曾谒见高宗,请求购买终南山上之树,每树付绢一匹,自言:山上之树虽尽,臣绢未竭。以此夸富。其二,玄宗皇帝曾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左右皆曰未见,急召大富商王元宝,元宝云隐约见一白物横在山顶。玄宗遂有感而言:我听说大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皆能见之。

巨富的效应,使君主产生“富可敌贵”的观念,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人们的观念逐渐在发生变化。但这时期的制度仍相对滞后,对工商业者及其子弟的入仕仍有严格限制。到唐后期,官僚士大夫仍把商贾列为“贱类”,认为商人从政是“上污卿监”、“下辱州县”。直到明代,王阳明才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士商异业而同道。”这是在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上扭转士商不同道的观念。如果说宋代的“取士不论家世”反映了地主阶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中,内部身份观念的解体,那么,“士商异业而同道”则从根本上阐明士与商的差别,仅是业之不同,而非道之有殊。这一观念的转变,经历了两千年左右的时间。

观念的更新,在实际生活中,滞后于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变化首先是非制度的渐变,然后才逐渐在制度上得到确立。文官选举对象,按规定限制在士的范围。但南北朝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北齐幼主卖官,“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唐中后期,“工商凡冗,或取上庠”。柳宗元曾以《吏商》为题,撰文论述吏与商之异同,以及吏商相混的现象。明人归有光所云“古时四民异业,今士与农商常相混”,说明当时商人入仕或士人经商已相当普遍。明清盛开捐例,“市井狙侏”通过捐纳方式大量涌进仕途,以致出现胡雪岩这样的亦商亦官,经商为本、捐官为用的“红顶商人”。可以说,商品经济首先瓦解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权相对固定基础上的贵族政治与贵族政治相适应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以“家世”作为选举依据的选举体制,使“取士不论家世”得以制度化,标志就是科举制的确立。但是,应该注意到,“不论家世”是限定在“士”的范围,并没有向广大工商业者敞开大门。商品经济的第二次冲击波,才使商人入仕